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七）

「迷信話語」

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變俗

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 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七）

「迷信話語」

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變俗

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十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

主 席：廖迪生

編 委：馬木池、馬健雄、張兆和
陳春聲、程美寶、黃永豪
劉志偉、潘淑華、蔡志祥

書 名：「迷信話語」：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變俗

編 者：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

封面設計：周晶

排 版：韋錦新

出 版：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傳真（852）23587774

電郵 schina@ust.hk

印 刷：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978-988-15741-9-0

© 2013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翻印。

致 謝

本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項目“Between Ghost and Ancestor: Grand Universal Salvation Rituals (萬緣勝會) of the Cantonese Chinese in South China, Hong Kong and the British Strait Settlements” (GRF.2110181)、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LWHT.690247)、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第五輪)：〈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出版經費得到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支持計劃〈地方歷史與遺產〉資助，謹致謝忱。

編輯凡例

1. 本書所輯的報章文獻，分「廣州（省垣）及一般」（GZ）、「廣東各屬」（GD）以及「香港、澳門」（HK、MA）收錄與神誕祭祀、迷信神權和風俗改良等相關之條目，並加以編號。
2. 本書文獻皆按照報章刊登日期編排，統一使用阿拉伯數字；文獻的版面信息，在日期後摘出。如（香港華字日報，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壹張叁頁，香港新聞），本書摘為：（香港華字日報，1918年3月27日，頁1：3，香港新聞）。
3. 部分條目有大小標題或副題，由編者循文獻主題調整，並在其後附上編按。
4. 部分條目無題，由編者按文意添設標題，並在其後附上編按。
5. 為方便閱讀，書後附設索引，列出各條目所在頁碼，並對主題作簡單概括，如：賽會・禁令。
6.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中的錯別字予以保留，並把相對的正字置於（）內。
7. 原文中的異體字，皆予以保留，並把相對的規範字置於（）內。
8. 原文中的簡體字，在不影響文意的情況下，皆以繁體字代替。
9. 原文漏字或不能識別的文字，用□代替。
10.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之格式排位皆予以保留。

序

新世紀的舊話語：移風變俗的工具

蔡志祥 韋錦新

「迷信話語」

19 世紀中葉以來，清朝政府的敗戰和屈辱的和約帶來的政治經濟問題，令到華界知識份子重新反思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意涵。信仰和道德倫理成為政治後果的代罪羔羊。他們相信中國近代化的主要窒礙來自封建迷信的文化本質。在皇朝社會，信仰只有正與邪之分。（見《點石齋畫報》〈崇正黜邪〉條）「毀淫祠」並非排除信仰，而是納信仰於國家控制的範圍之內。「所以有神道設教也。……維持世教之衰微，挽回風氣之涼薄，莫如玉曆寶筏一書」（《繪圖玉曆寶鈔勸世文》民國八年，〈暨陽余氏序〉）。正邪與否，在教化的理念下是相對的概念。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西化成為正確的新思潮。相對於作為西化基礎的科學，信仰是腐化人心的迷信，是不可以和科學並立的妖孽。因此，移風變俗、掃除迷信成為當代的社會精英、知識份子、讀書人的共同的、正確的話語。報章扮演了推動科學、反對迷信、改良風俗的重要角色。中外的華文報章如上海的《申報》、香港的《華字日報》、新加坡的《叻報》和檳榔嶼的《檳城新報》屢屢闡析何謂迷信、攻擊神權、教育民眾為己任的報導。如「……吾人投身輿論界、壹矢口、壹搖筆、皆所以開通民智……」（〈闢迷信〉，《華字日報》：1923 年 9 月 3 日，第一張第二頁）、「……二十世紀為民智大開時代，何物善棍尚作此等怪異現象，選而登之，所著其罪也……」（《檳城新報》：1908 年 9 月 18 日）。

對迷信的鞭笞，在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戮力推行改良社會的各種新生活、新建設的運動下，成為正確的話語。¹ 勸善書如玉曆寶

¹ 關於反迷信的討論，可以參考潘淑華(Poon Shuk-wah)在本書的論文、氏著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以

鈔在這個時候、也一改向來的神道設教的語調，指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久已成為天演公例」（《繪圖玉曆寶鈔勸世文》，民國十七年，〈海鹽孫勉之序〉）反迷信是在國家機器支撐下的不可妥協的正確行為。關於破除迷信的論述，譴責迷信行為的報導，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報章，刊載不絕。也正因為如此，19 世紀末以來的華文報章，在反迷信的聲浪中，刊載了無數的地方社會的信仰行為，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清末民初民眾對國家、對知識份子的反迷信話語的對應。

例如 1908 年 9 月 18 日在反迷信聲中，《檳城新報》刊登了如下倡建萬善緣勝會的廣告：

粵東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勝會廣告

二十世紀為民智大開時代，何物善棍尚作此等怪異現象，選而登之，所著其罪也。

佛氏以慈悲之熱念，發宏願毅力，為超度眾生之說，於是有出地獄大堂之偉想，使乎抱憾以歿之幽魂，皆得離苦海，以生樂國，嗟夫死者已矣，其苦惱已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尚欲為之拯救，而不能已，則天生人之疾苦，其亟亟於謀拯救，慨可知矣，我方便留醫善醫院，救生人之疾苦者也，自庚子開辦至今，已歷八載，其到院就醫者，多危症，年中留醫數千人，凡外埠內地之抱有疾苦，而無所依倚者，咸賴之計，醫愈而出院者數萬人，而其中路斃而不及救，與夫服藥而不能救者，其數亦相等同，人用是心竊憫焉，哀幽魂之無歸，既謀拯救於生前，復思拯救於死後，爰議倡建萬善緣，曾為水陸道場，招致羅浮道長鼎湖高僧擇地建設，以吾粵同胞之抱憾以歿者，若金山地震，香港風災，旅外僑商喪身異地，又若永鎮藥庫之倒轟，焚賽珍酒樓之壓，保安漢口兩輪之火熱水溺，殃及多命，瀕年癘疫死傷之慘，積久頓忘，□□最近者，各

及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等關於國民政府反迷信政策的討論。

IV 迷信話語

屬水災男女老少之橫死者，不可勝數也，幸無數之幽魂，使與本院留醫而不及救之幽魂，回受超度之法力，豈不善歟，惟是道場建設，需款既鉅，本院年中經費數萬，全賴各同人及諸善士捐題，竭蹶時形，萬難獨任，況在綢繆兼顧之時乎，為此刊錄緣部，分送捐冊，所賴善信諸君，捐鉅款以成美舉，有厚望焉，是為引。

一擇西關黃沙火車頭新沙口之東水陸通津處，建設釋道兩壇，定期八月初七日辰時啟壇，七晝連宵功德，所有辦事規則，另紙列明，祈到公所取閱。

一公所設在十七甫愛育堂左鄰為辦事收支處，如各善信捐助經費，認送應用各物及附荐經費，請到公所掛號交收，如各鄉捐助，請交輪拖渡船賬房代收，各埠請交代理字號，注收均送回收條，以昭核實。

一本公所並無下鄉沿門勸捐，倘有假借本院公所名目在各鄉冒混沿簽者，定必查究，諸善信勿為所愚是禱。

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同人公啟

翌日即 1908 年 9 月 19 日，又刊登了有關萬善緣的報導：

請看萬善緣內容之怪狀

昨日近黃沙地方沿途異常擠擁，下流社會之人摩肩並進，遇有女子則合羣擠之，或穢語調笑，或上下其手，及至火車頭地方，則見所謂萬善緣之醮棚，高插霄漢，入其中則分僧道尼三壇，每壇洋燈以萬火計，對面一棚懸一口繡橫眉，題曰如入山陰道中，大壇兩旁有紙紮之所謂十王殿，蛇神牛鬼不可名狀，男女雜遝，奢蕩不禁，再過則有附薦棚，哭聲震天，雜以笑語，燈光射目，棚內女子或坐或臥，四旁觀者，則眈眈口，臺上擺列神主如華林寺之五百羅漢，亦有紙紮人形，或穿真衣冠僧道等輩，齋魚粥鼓，立於各神主之前，口喃喃不知作何語，眼灼灼四面注射，最後則有巡警局之消防隊為之捍衛云。

這兩則報導，提供了 20 世紀初在廣州市舉辦之萬緣會的組織過程、儀式內容以及社會參與情形。報章的詳細記載，往往亦保存了豐富的社會場景和活動細節。如林國輝引述早期香港《華字日報》的一篇資料：

港地連日醮會之舉，恭迎列聖鑾輿，鎮遊街巷，絲竹管絃之盛，則有洋洋盈耳之笙歌，衣冠錦繡之儀，則為落落大觀之人物。二龍飛舞，將欲躍淵見田，五鳳跨遊，恒願凌霄接□。□歷紫薇之巷，燕舞翩翩，東過蘭桂之芳，馬騰簇簇，旌旗歷亂，真堪耀目炫神，翡翠迷離，亦足賞心快志。又況會□花果，盤設盂蘭，宣佛法於無邊，啟壇場之浩蕩，結若蜃樓，不少繭絲蟬殼，幻成海市，居然萬戶千門，鶯院花香，宏招蝶使，法場善廣，遍誦菩提，羽衣則說道德之言，五千一貫；比丘則證如來之法，萬億歸虛。奪目張燈，風來則有聲鏗鏘爾，迎神結彩，雅化則靜寂肅然，將見識六如之道，咸登歡喜之鄉，空三昧之心，眾拔憂愁之國矣。

○本港賽會之設，有以稚年小子，巧裝昔人故事，使之騎馬遍歷街衢，以為樂趣者，殊不足觀。況當炎天赤日，煩苦備至，在彼小子，實有慘不可言，乃父若兄，又何忍樂而為此風會之陋習，真可怪哉！²

這篇 1870 年代《華字日報》的報導原文已佚，並未收入本書。³ 但它所描述的節日儀式場景，可以為香港中西區現時仍然舉辦的盂蘭勝會提供參照。假如比較賽會時以小童裝扮遊街，如果早在港地蔚然成風，更引人生出疑問，如長洲島等地太平清醮會景巡

² 〈記香港醮會（選錄香港華字日報）〉，載《申報》1872 年 9 月 5 日，轉引自林國輝，〈《申報》所見的兩則香港史研究資料〉，載《華南研究資料通訊》第 51 期，頁 28。

³ 《申報》有為數不少的關於節日的報導。本書因範圍所限，未有收錄。

遊的飄色，為何會流傳 1930 年代島上居民赴佛山等地觀看飄色並帶回成俗之說法，其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在報章對信仰儀式的評判語言的背後，往往不自覺地把儀式的行事內容詳盡的報導出來，從而提供給研究者寶貴的材料。

編撰緣起

本書始自潘淑華對清末民初的廣州報刊資料如《越華報》、《國華報》和《廣州民國日報》等所做的收集整理工作。在隨後的編撰過程中，我們加入了《香港華字日報》、《天光報》、《（香港）工商日報》，以及《華僑日報》等主要在香港刊行的報章。這些報章的社會新聞和風俗記憶所關注的地域，亦主要集中在粵省與港澳。

在資料搜集過程中，類似的記述比比皆是，限於篇幅，無法一一盡錄。本書的編輯，在目力所及之下，擷取了不同的題例，主要關注了下面三點：首先就內容而言，許多是系列的報導，主要是一些社會歷史事件。有突發的災難，如香港馬場大火浩劫，江門赴德慶悅城龍母廟進香船被焚；也有官方的祭典，如公祭黃花崗烈士；或民間和半官方機構所舉辦的大型儀式活動，如方便醫院以追悼十九路軍名義的超幽大會。這些事件的社會影響廣泛而深遠，或對施政帶來改變，或在其後形成週期性的民俗活動傳統。

其次關於每年固定的活動，在歷年的報導都有跡可尋，如盂蘭勝會、各種神誕祭祀等等。此外，還有一些特定的主題，如喪俗、超幽建醮和萬人緣、龍舟、巡遊等等。或與民生和法律、社會治安相關的募捐詐騙、酬神失慎、巫覡惑人等條目。這些特定的主題，豐富精彩，亦偶帶詼諧和寓意。

最後在記述民俗的同時，亦常常附帶作者對其利弊的立場與評論，以戲謔諷刺時局。這些評論的話語，多與時政的變化有關，尤其受政府所推行的風俗改良和破除迷信運動影響，和它們一起出現的，通常是政令的施行與改變。而在中國被長久討論的神權與人權、政權之爭，亦時見報端。而更有趣的是，這些討論和報導的風格取向，時有反覆。可以確信的是，這樣的反覆，今後仍然會在華人社會長久持續下去。

章節安排

本書所輯的報章文獻，分「廣州（省垣）及一般」（GZ）、「廣東各屬」（GD）以及「香港、澳門」（HK、MA）收錄與神誕祭祀、迷信神權和風俗改良等相關之條目，並加以編號，按照報章刊登日期順序編排。

這一安排，主要與所選輯報刊的記載方式有關。許多與本書主題相關的社會新聞和論說，都以「羊城」或「粵省（省垣）」、「各屬新聞」加地名，和「香港」或「本埠」來作地域的區分。本書沿用，並於書後列出索引，為各條目文獻所記載的不同主題和內容主旨附加說明，以便讀者閱讀和參照。

文 章

英靈與餓鬼： 民國時期廣東地區的孟蘭節與萬緣會

潘淑華

引言

在1932年10月14日的《越華報》上，刊登了兩則由廣州城西方便醫院發出的追悼大會啟事。在第一則啟事中，方便醫院向各界宣佈追悼大會將於1932年11月14日開始，為期一連七日夜，追悼的對象是在當年一月日本侵略上海中抗敵犧牲的十九路軍將士，¹ 由廣東總司令陳濟棠領導的第一集團軍的剿共陣亡將士，以及殉職的海陸空軍警。而除了這些為國犧牲的「英靈」外，追悼名單之末是天災中的死難者，以及在方便醫院身故而由方便醫院埋葬的死者。啟事中亦列明追悼會開幕禮的儀式，當中充滿了對國家符號與意象的崇敬，例如是恭讀孫中山的遺囑，對黨旗、國旗、孫中山遺像和為國捐軀烈士的靈位行鞠躬禮。² 若我們單看這則啟事，得到的印象很可能是這只不過是民國時期廣州的一次官方悼念活動，通過頌揚烈士為國捐軀的精神，來推動愛國主義及反共情緒。然而我們仍不免有一些疑問：為何這次追悼烈士的活動會由方便醫院這所廣州的善堂籌辦，以及為何追悼會為期七日夜。

¹ 「十九路軍」從鄧鏗及李濟琛的「粵軍」發展起來，因此軍中多為廣東人，1930年被國民政府編為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廣東東莞人），軍長為蔡廷鍇（廣東羅定人）。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時，駐上海的十九路軍成為抗日主力，但在抗敵過程中並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援，結果死傷慘重。廣州於1933年修建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以安葬陣亡將士。在陵園內的《抗日陣亡將士題名錄》上刻有1951名陣亡士兵的名字。見左雙文、關召，〈廣州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1期），頁235-240；廣州市文化局編，《廣州文物志》（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頁95-96；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33），頁140-141，541，556。

² 〈廣州方便醫院追悼大會啟事〉，《越華報》1932年11月14日，頁1。

而第二則啟事是一則鳴謝啟事。廣州方便醫院在啟事中鳴謝參與追悼會的各寺院、道觀及菴堂，對他們將會在追悼會中連續多天誦經禮懺表示感謝。鳴謝名單中有廣州以外及本地的佛寺、道觀及菴堂，來自廣州以外的有鼎湖山慶雲寺、羅浮山華首台、清遠太和古洞、羅浮山沖虛觀、開平縣道院、西樵雲泉寺等，而廣州本地的則有檀度菴、應元宮、三元宮、華林寺、永善菴及上西關各菴等。³ 從這則鳴謝啟事中，我們了解到方便醫院的追悼會不單是充滿政治色彩的悼念烈士活動，亦是一次大型的宗教活動，進行七晝夜，應該是為了符合齋醮儀式為期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宗教習慣。

若我們從報章的報導繼續追縱這次追悼會的發展，會發現這次事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讓我們了解民國時期南中國的國家、社會與民間宗教的關係。不少研究討論了中華帝國時期及 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後這三者的關係，指出在帝國時期，民間宗教如何統合地域社會，及如何作為幫助地域社會融入國家文化體系的媒介；在 1949 年中共政權成立後，國家如何通過「反宗教」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而近年民間宗教的復興，又如何反映及改變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⁴ 國家、社會與民間宗教三者的關係在民國時期究竟與帝國時期及中共政權成立後有何不同，近年來已引起了一

³ 〈廣州方便醫院追悼大會鳴謝〉，《越華報》1932 年 11 月 14 日，頁 2。

⁴ 例如 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Sea,"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292-324;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有關中共政權下的宗教發展，可參看 Donald E. MacInnis,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Policy and Practice*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9)；Julian F. Pas ed., *The Turning of the Tide: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Luo Zhufeng, ed., translated by Donald E. MacInnis and Zheng Xi'an, *Religion under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有關近年民間宗教在中國大陸的復興，可參考 Thomas David DuBois,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Adam Yuet Chau,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些學者的關注。⁵ 要處理這個問題，政府檔案固然能夠幫助我們明瞭官方的宗教政策，但若要了解民間社會的回應，以及這些政策對民間宗教活動的影響，報章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料。⁶

本文嘗試以本資料集中有關廣東地區的盂蘭節與萬緣會的報章報導，⁷ 來探討民國時期南中國在宗教儀式上生者對死者（即超幽）的處理，⁸ 如何揭示及塑造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會分析兩種超幽活動，一種是在盂蘭節進行的定期性的超幽活動，另一種是不定期的超幽，主要在造成重大人命傷亡的意外或天災後舉行。第二部分會分析在民國時期，超幽這種本是處理家庭及社區層次的亡魂的宗教儀式，如何及為何會與國家民族的亡魂聯結起來，使超幽儀式不單超度「餓鬼」，亦超度為國家民族犧牲的「英靈」。在最後一部分，會分析超幽活動如何反映國家及社會在民國時期的變化。本文的論點有二：首先，過往的研究指出民族主義的興起是「現代性」的產物，而現代性會促使社會的世俗化及宗教的式微。在民國時期，官方政策亦強調現代性與民間宗教的對立，指民間宗教是「迷信」，有礙「進化」，但在此文章中，我們看到民間傳統的超幽活動借助民族主義而變得規模更盛大，可見民間宗教不斷自我調適的特性，以配合現代性及民族主義的興起。其次，不少研究指出中國自晚清開始，隨著城市的現代化，導致城鄉

⁵ 近年這方面的研究包括拙作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⁶ 康豹(Paul Katz) 及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亦進行了「近現代中國城市道士與廟宇」的研究課題，搜集與出版相關的報刊資料是其研究課題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

⁷ 資料集有關廣州部分的報章資料主要來自《越華報》及《國華報》，它們是廣州兩份主要報章。根據粵海關的資料，在 1930 年代初，《越華報》每天發行 7000 份，是廣州發行量最高的報章，而《國華報》的發行量則有 3000 份。見〈粵海關十年報告，1921-1931〉，《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121。

⁸ 「死者」可包括死者的屍體及魂魄，而本文探討的是魂魄方面。

關係的斷裂。⁹ 但從萬緣會的例子，可見民國時期的民間宗教活動仍然聯繫著城與鄉，城鄉的界線並不明顯。

一、定期與不定期的超幽活動

「建醮超幽」，即通過僧、道、巫或尼主持的宗教儀式來超度幽魂，以潔淨社區。對南中國的民眾來說，這是與慶祝神誕有著同等重要性的宗教活動。民眾的超幽活動有定期的，亦有不定期的，定期的超幽活動，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主要是在農曆七月的盂蘭節舉行。¹⁰ 而不定期的超幽活動，則是在造成巨大傷亡的慘劇後進行。

雖然盂蘭節普遍被視為佛教節日，但根據太史文(Stephen Teiser)的研究，在佛教傳入前，中國社會已存在於農曆七月向祖先供奉祭品的傳統。在佛教傳入後，中國本土的宗教傳統與佛教結合。而目連救母這個解釋盂蘭節起源的佛教故事，有學者指其實源出於中國。¹¹ 目連救母的故事通過說唱文學而得以在中國普及，成為家喻戶曉的佛教故事。故事中僧人目連的母親死後變為餓鬼，她的咽喉變得如針般幼細，目連在祖先壇上為她獻上供品，但當她把兒子供奉的食物放到嘴邊，食物即化為火焰。佛祖向目連授以拯救

⁹ 例如 Antonia Finnane, "A Place in the Nation: Yangzhou and the Idle Talk Controversy of 1934,"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4 (November 1994), pp. 1150-1174;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pp. 63-4.

¹⁰ 在香港的一些農村，除了在盂蘭節舉行超幽外，太平清醮亦是進行超幽儀式的重要宗教活動。可參看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在民國時期廣東省的一些農村，亦有定期舉行保境醮（即類似香港的太平清醮），但報章報導並沒有描述當中的超幽儀式。報導者所關注的，主要是保境醮中蓋搭戲棚演戲及會景巡遊，例子可見南海豐崗鄉及古崗鄉保境醮的報導，〈農民踴躍慶豐年，仙村舉行大會景〉，《越華報》1935年2月15日，頁9；〈南海古崗鄉演劇風波〉，《國華報》1935年12月17日，頁2:4。

¹¹ 最早記載目連救母故事的佛經是於公元五至六世紀成書的《盂蘭盆經》。有學者指此佛經出自印度西北部，但亦有學者認為其源出中國。見 Stephen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8-55.